



政治科 學季評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BOOK REVIEW



國 内
郵 資 已 付

台北郵局許可證
台北字第1908號
台北 杭南 郵局
雜誌 交寄

二〇一二年三月 第三十三期

March 2012 No.33

ISSN 2222-6788

《長篇書評》

陳方隅

贏者全拿：政治、經濟與貧富不均

- | The Winner-Take-All Society | Robert Frank and Philip Cook
- | The Silent Takeover | Noreena Hertz
- | Unequal Democracy | Larry Bartels
- | Winner-Take-All Politics | Jacob Hacker and Paul Pierson

《短篇書評》

左宜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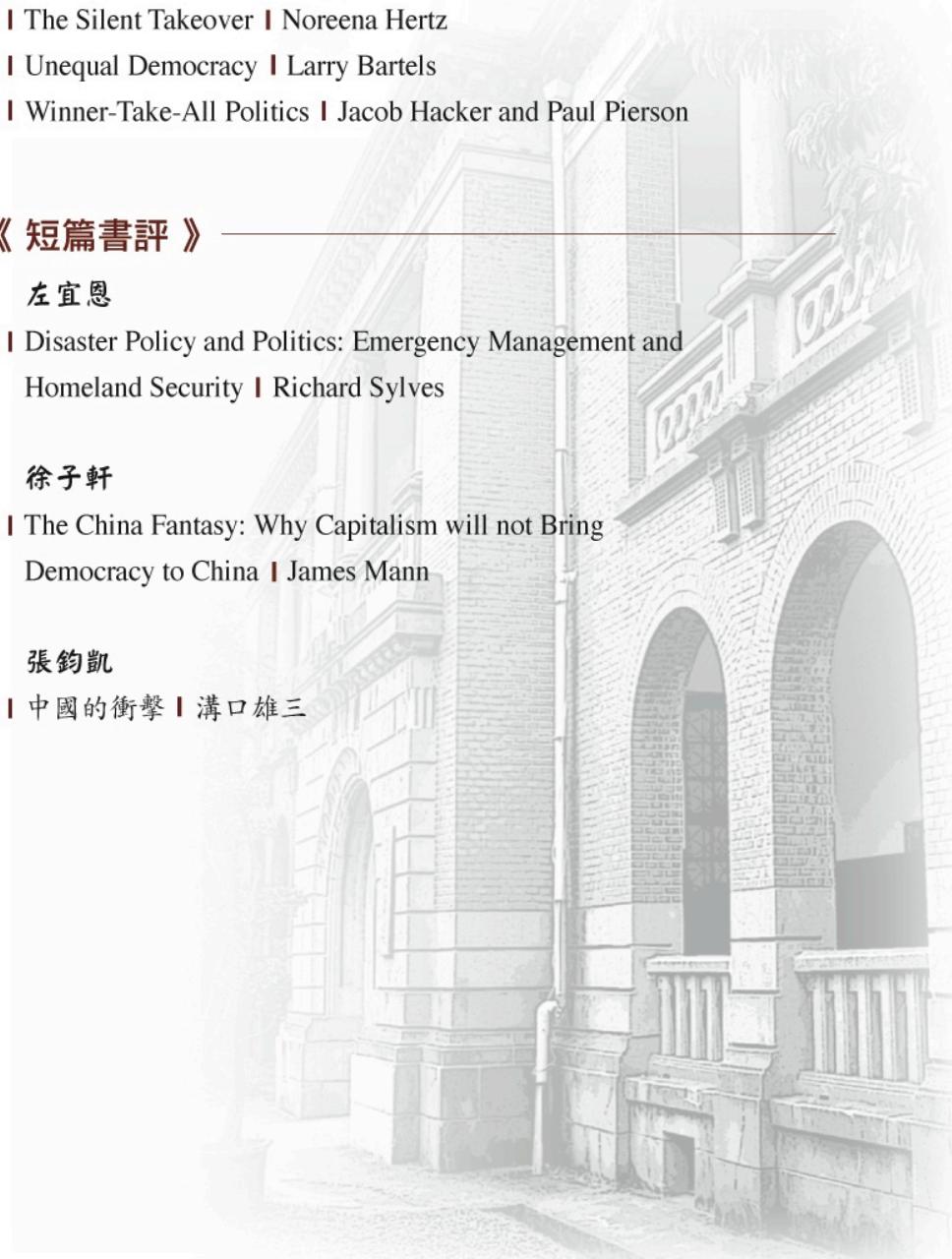
- | Disaster Policy and Politics: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Homeland Security | Richard Sylves

徐子軒

- | The China Fantasy: Why Capitalism will not Bring Democracy to China | James Mann

張鈞凱

- | 中國的衝擊 | 溝口雄三



揮筆灑墨

為所當為

相信文字具有力量是知識份子堅定不移的信念；
揮筆灑墨，為所當為則是知識份子的擔當。

目 次

〈長篇書評〉

Robert Frank and Philip Cook	The Winner-Take-All Society: Why the Few at the Top Get So Much More Than the Rest of Us	陳方隅 1
Noreena Hertz	The Silent Takeover: 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Death of Democracy	
Larry Bartels	Unequal Democrac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Gilded Age	
Jacob Hacker and Paul Pierson	Winner-Take-All Politics: How Washington Made the Rich Richer--and Turned Its Back on the Middle Class	

〈短篇書評〉

Richard Sylves	Disaster Policy and Politics: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Homeland Security	左宜恩 11
James Mann	The China Fantasy: Why Capitalism will not Bring Democracy to China	徐子軒 16
溝口雄三	中國的衝擊	張鈞凱 20

政治科學季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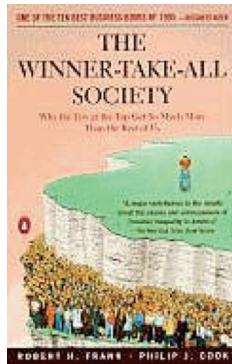
二〇一二年三月
第三十三期



資深編輯顧問	王業立、石之瑜、江瑞祥
編輯顧問	陳亮宇
主編	蕭育和
執行編輯	陳方隅
編輯委員	李天申、江俊宜、江俊儒、陳亮宇、陳瑋鴻、 蘇翊豪、蘇軍璋
發行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
	地址：100 臺北市徐州路 21 號
	電話：(02) 2391-8756

贏者全拿：政治、經濟與貧富不均

陳方隅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書名：The Winner-Take-All Society: Why the Few at the Top Get So Much More Than the Rest of Us

作者：Robert Frank and Philip Coo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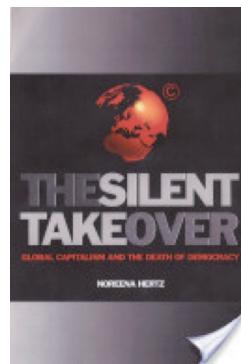
出版者：The Free Press.

出版地：Massachusetts

年份：1995

頁數：288 頁

ISBN：0753522268



書名：The Silent Takeover: 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Death of Democracy

作者：Noreena Hert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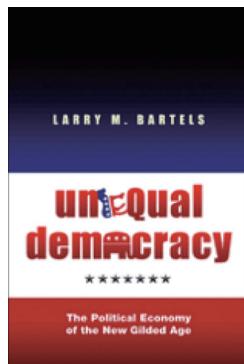
出版者：The Free Press.

出版地：Massachusetts.

年份：2001

頁數：256 頁

ISBN：0743234782



書名：Unequal Democrac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Gilded Age

作者：Larry Bartel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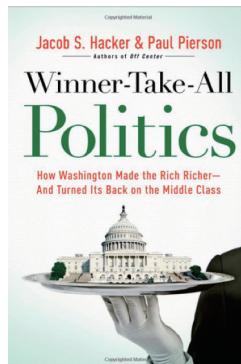
出版者：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出版地：Princeton, NJ

年份：2008

頁數：328 頁

ISBN：0691136637



書名：Winner-Take-All Politics: How Washington Made the Rich Richer--and Turned Its Back on the Middle Class.

作者：Jacob Hacker and Paul Pierson

出版者：Simon & Schuster, Inc.

出版地：New York

年份：2010

頁數：368 頁

ISBN：1416588698

“The supreme political task of our day is to drive the special interests out of our public life.”

——Theodore Roosevelt¹

一、前言

2010年底從突尼西亞開始，爆發「阿拉伯之春」群眾運動，起因是長期的威權統治以及嚴重的失業和貧富不均問題。2011年9月17日起，上千名民眾進入紐約金融中心華爾街示威抗議，全美各大城市以及全球都出現響應「佔領」運動的風潮，抗議貧富差距懸殊，被視為99%被統治的大眾對財富金字塔頂端1%精英的反撲。

經濟發展過程當中的「貧富不均」議題已引起眾多的論著討論，然而並

沒有定於一尊的說法。本文的目的在從眾多解釋不平等現象的經濟及政治理論中，描述學界從經濟解釋到政治解釋的不同焦點，筆者嘗試挑選並介紹在概念上有所交鋒之作品。圖1為簡單的分析示意圖，在分析框架上，我們可以看到清楚的轉變：第一，經濟上扭曲的自由市場機制(a)；第二，政治方面，國家或政黨不同的政策選擇(b)；第三，政治與經濟的聯合體制，導致不平等的惡化、各種消除不平等的政策工具失敗(c影響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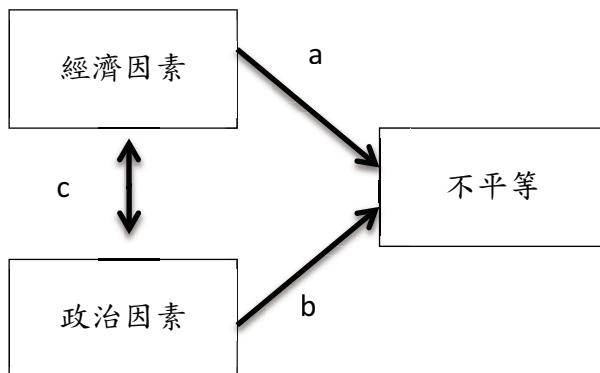


圖1 不平等現象解釋簡圖

來源：作者自製

¹ Waldman (2003)，轉引自 Hacker and Pierson (2010:306)。

Frank and Cook (1996) 率先將財富集中於少數人的現象稱做「贏者全拿社會」(Winner-Take-All Society)，並以市場競爭機制解釋其起因。² 1999年WTO舉行西雅圖部長會議時，「反全球化」的大規模抗議揭開序幕，其後許多專書及論文都著重在全球化及經濟因素如何導致不平等的所得分配，每位學者也都嘗試提供解方。若以圖1的示意圖來看，許多作品是以箭號a的論述為主。然而，有愈來愈多學者開始認知到，問題並不在於市場機制，而將焦點轉向政治層面。例如Hertz (2001) 認為大企業正在「購併」(takeover)國家；Bartels (2008) 指出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執政時的所得分配狀況有顯著差異，即總統政策選擇會影響到不平等的程度；³而Hacker and Pierson 於2010年出版*Winner-Take-All Politics*一書，⁴更是將焦點放在整個政治經濟體制與貧富差距之間的因果關係。筆者嘗試將不同的解釋途徑放在一起討論，欲提出的論點很簡單：貧富不均現象是因為經濟資源轉化而成的政治資源分配不均所造成。

² 本書中譯本譯名為《贏家通吃的社會》。Robert Frank 現任教於Cornell University 經濟系，Philip Cook 任教於Stanford University 公行系。

³ Noreena Hertz 任教於Erasmus University。Larry Bartels 現任教於Vanderbilt University。當然不只這些著作討論政治與不平等的關係，例如：Paul Krugman (2007) 認為體制、政策準則與政治力量的改變，比經濟因素更能解釋不平等現象升高。

⁴ Jacob Hacker 任教於Yale University 政治系，Paul Pierson 任教於UC Berkeley 政治系。

二、贏者全拿的社會：市場機制與不平等

古典經濟學強調自由市場機制，造成所得收入不平等的因素是經濟要素上的差異，如：個人的資質與能力，所以不平等是經濟發展之下的正常現象。Frank and Cook (1996) 在書中首先就是論證這些造成不平等現象的經濟因素，不過，與傳統解釋不同的是，作者更強調經濟發展與科技進步造成「贏者全拿」的就業與市場現實面：由於科技進步帶來的資訊和生產要素（尤其是人力資源）的高度流動性，使得愈來愈多人必須高價競逐少數的資源。例如，公司必須出高薪留住一個傑出的管理人才，否則會被別間公司挖角。而整個社會的分配機制也傾向給予贏家超額的報酬，非常少許的差異就會造成巨大的所得分配差異，如同每個體育或藝術的競賽當中，金牌與其他名次的差異可能極微小，但媒體關注程度卻差很多，連帶使得獎金所得差距拉大。在傳播科技發達的今日社會，大眾傾向於只關心那些極少數的贏家，使得他們得以享有高額的利潤。Frank and Cook指出，這樣的「贏者全拿市場」存在幾乎每個國家，如此一來造成的後果是，競爭機制延伸到各個經濟生活領域就會造成資源大量的錯置，因為總是有過多的人力物力投入追求某些超額報酬高的職業或獎項，而非平均分配到不同面向的生產過程使社會利益極大化。同時，

社會資源的浪費也使得經濟成長果實無法雨露均霑，並且帶來少部份贏家與其他人的所得差距拉大的結果。

不過，雖然兩位作者率先將財富集中在少數人的現象命名為「贏者全拿」，也指出了資源錯置會帶來有害發展的社會或經濟後果，但這樣的解釋途徑並不能完全解釋貧富差異現象。在經濟因素本身的部份（圖 1 當中箭號 a）作者沒有指出資源錯置的情形到底有多嚴重，畢竟市場經濟至今仍然持續運作；更何況，所有的投資最終仍需通過市場及消費者的檢驗，我們很難論證各行各業的消費者都會盲目追求少數贏家產業或公司產品，也很難界定何為「過度投資」。體育、藝術或是其他行業當中對贏家的特別關注，可能也無法解釋全球日益嚴重的貧富不均現象，因為這些人的所得收入可能只佔富有階級當中的一小部份而已，無法解釋有錢人的財富高度集中。⁵ 若只關注市場層面，明顯的忽略政治因素以及政治與經濟的互動（圖 1 當中箭號 c 與 b），像平均工資下降、政府的各種對富人減稅或是刪減福利政策的作為等因素皆非經濟因素可解釋。即使作者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議，但這些改革有可能會出現嗎？在此，我們必須轉向「政治過程」的討論。

⁵ Hacker and Pierson (2010:45) 對此也提出批判。

三、當企業購併國家：經濟影響政治

在政治層面，Hertz (2001) 提出大企業影響國家「政策選擇」的現象，並且發出警語：自 1970 年代市場化、民營化的風潮以來，主要大國的政治人物鼓吹的皆是自由放任經濟學、消費文化、財務與自由貿易力量為基礎的制度，而這是一套以企業為首、國家為附庸、國民成為消費者的制度，無聲地將民主制度瓦解。若以 GDP 衡量經濟體的大小，全球前一百大經濟體有超過一半是企業，資本家利用市場經濟而壯大，透過獻金控制政治人物、控制大眾傳媒等方式擴大影響力，進而可以操控國家的政策。而作者擔心這樣的趨勢之下，企業的財富與權勢將會完全凌駕並取代國家主權，亦即「企業國家」。她指出美國現在已進入了「企業國家」(Corporate State) 的政府階段，政治變成是替企業服務而存在。

作者在書中舉出非常多的案例與數據，證明資本主義經濟之下的不平等加劇，同時也有許多企業的擴張過程。不過，雖然本書提出的現象與趨勢相當發人深省，但有一些疑問有待解決。首先，國家的角色已經被取代了嗎？企業對政策制定的影響力增加在研究上該如何操作化？再者，最大的問題是，作者似乎並沒有建立一個清楚的因果關係。例如，我們並不清

楚市場化、民營化的風潮，以及柴契爾夫人與雷根開始的「由上往下分配的經濟政策」到底是企業力量開始凌駕國家的原因還是結果；少數企業太過強大，是因為市場機制出問題，還是正常現象？進一步來說，企業影響國家決策，是因為他們本身實力本來就會如此，還是國家相關規範與決策程序不足所造成？筆者認為 Hertz 並沒有要挑戰市場機制所造成的經濟不平等現象（圖 1 當中箭號 a），而是認為市場機制之下經濟實力強的企業或鉅富有很大的能力去影響政府決策，因而「加深」不平等。在此我們可以看到政治因素已開始被加入到貧富不均的解釋當中，不過作者似乎認為圖 1 當中的箭號 c 是一個單向的箭頭，即經濟影響（購併）政治，不平等是由於政策選擇（箭號 b）所造成。至於，到底是「誰」在影響且「如何」影響各國政府的政策選擇？書中論述並不充足，而這就必須和下兩本書要介紹的論點一同處理。

四、不平等的民主

Bartels (2008) 表示其作品最重要的是告訴大家「政治因素」的重要性（圖 1 當中箭號 b），不同的政黨以及政治人物影響政策選擇，而造成美國的民主運作是一種不平等的民主（unequal democracy）。在其作品當中，作者主要利用幾個部份來呈現政治因素對不平等的影響。

首先，作者用量化統計模型證明美國的政黨政治對所得分配有顯著影響。民主與共和兩大黨的行政官員在總體經濟政策以及個人重分配等福利政策上皆有顯著差異，並非向「中位選民」(median voter) 定理所預測的那樣（各黨必須爭取中間選民而使政策趨向一致）。根據參議員立法投票選擇的實證研究，同樣一州選出不同黨的議員，其政策取向差異遠大於從較保守的州和較自由的州所選出的同黨議員差異；另根據民主與共和黨執政時的經濟狀況，民主黨較能夠降低失業率與帶來經濟成長，共和黨較能降低通膨但是不平等的狀況增加。Bartels 呈現出的家庭收入成長趨勢顯示，最富有的 20% 家戶所得成長率在兩黨執政下差不多，而收入較低的家庭在共和黨執政時成長率較低。⁶

其次，大眾對某項議題的信念和其政策偏好僅為低度相關。舉例來說，超過 85% 的美國人在調查研究中回答支持「應該盡力推動機會平等」的價值，但是針對有助於消除貧富差距的特定法案卻不一定會有高支持率。這是由於多數民眾無法理解各法案所帶來的實際後果：一個支持「平等價值」的民眾，可能因為平常不接觸政治議題，而對布希政府的大企業減稅方案

⁶ 不過，用五等分家戶所得其實看不出財富的高度集中現象（參見第五段中的評論及註釋 10），且同樣的成長率對不同所得級距來說對應的數目相差非常大，也較難看出對貧富不均的影響。

表示支持。

第三，執政者只會在意有錢人以及中產階級的選票，低收入的民眾偏好無法影響到國會議員在各項分配政策相關的投票取向，因此美國的民主其實是一種不平等的民主。即使面對大眾的壓力，政治菁英仍最能影響議程和議案。像最低工資的調漲問題，當民眾皆要求調漲的時候，此議案不只被拖延，就算是較重視重分配的民主黨掌握國會，也只敢做象徵性的調整。⁷ 作者的重點是：政黨以及意識型態比起選民的偏好更能左右國會議員的立法選擇，而政黨及政治人物的政策並無法平等的照顧到所有選民。

本書以實證模型證實政治因素對經濟不平等相關政策的影響，主要的解釋變數是「政治菁英」以及其面對的民主過程（圖1當中的箭號b），而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就是經濟上的因素（箭號c）。接下來，學者更進一步分析整個政治經濟體制當中造成貧富不均的因素。

五、贏者全拿的政治

Hacker and Pierson (2010) 的分析焦點專注在美國自 1970 年代以來的所得不平等現象，並且證明了經濟實力與政治過程相結合才是造成「貧富不均」的主要原因。在論述方面，作者

首先指出不平等的高度集中現象：財富集中至最頂端的人手中，2006 年全美 1% 的有錢人所得佔全體收入的 18% 以上（1979 年為全體 8%，其所得為後五分之一的人所得 9.6 倍，2005 年為 17.2 倍）；⁸ 其次，富有階級的財富穩定地、大幅度地增加，中產階級財富僅微幅成長，而底層階級則持續探底；第三，對非有錢人而言，經濟成長及所得分配政策帶來的收益極為有限。

為探討不平等的起因，過往的文獻已經開始挑戰經濟不平等現象當中的政治因素，但是作者認為存在幾項缺失：（一）主要還是以經濟因素解釋，即科技進步帶來技術差異、市場機制適者生存的邏輯。但這無法解釋為什麼財富向極少數人集中、為什麼這個現象在美國最為嚴重。例如 Top 1% 和 Top 2% 至 20% 可能都是受過同樣的教育水準，但所得卻差很多；各行各業的技術差異在美國可能不是最大，但財富差距卻最大。⁹ （二）在研究方法上忽略特定少數人的不平等程度，大多採取收入五等分法作區分。¹⁰ （三）太過強調中位選民（median voter）定

⁸ Hacker and Pierson (2010:48)。若計算三十年來家戶所得成長率差距，參見 Hacker and Pierson (2010:23)。

⁹ 國際主要國家的 1% 有錢人所得佔全體所得百分比的比較，參見 Hacker and Pierson (2010:39)。

¹⁰ Bartels (2008) 即是採用這個指標。若用所得 80-20 百分比作貧富差距的對比，過去三十年來所得差距從 3 倍上升到 3.8 倍，看不出財富集中至少數人的現象。若以頂端 1% 對比後 20%，則此倍數為 17.2 倍。

⁷ 參見 Bartels (2008:229-239)。

理，認為民主化賦予中位選民投票權利（以及各種社會團體組織的權利），執政者必須回應其財富重分配的需求；但是實際上稅收及福利政策卻不斷減少，如同 Bartels (2008) 證明政治菁英並不必然回應選民的需求。學者則加入許多因素解釋模型的失誤，如移民太多導致中位選民收入階級下修。不過，傳統的理論對於種種的減稅、去管制化等對有錢人有利的各種政策卻仍然無法解釋其因果機制，忽略特殊利益團體和資本家對政治的影響力。

(四) 對「政策」的概念太狹隘，造成不平等的政策絕不只稅收、基本工資等問題，還有像金融市場的管制等等；除了對有錢人有利的立法「作為」(enactment)，應該也要分析對中產階級有利的立法「不作為」(drift)。

作者認為造成財富高度集中現象的主要原因是來自組織性利益 (organized interest) 的力量，簡單來說就是「金權政治」。現代民主政治不管是選舉期間或者是平時的遊說都需要巨額的經費及組織的能力，個人的影響力有限。選舉期間的政治獻金數目已經令人咋舌，競選經費每年都在攀升，但比起每年數十億美元的遊說費用也只是小巫見大巫。大多數的選民是很難被組織與動員的，而大企業與利益團體則有資源可以組織起來，在政治中心—華盛頓特區—進行各種遊說。作者舉出第一手和第二手資料論證，大公司及其利益團體除了迫使

政府「通過」各項有利於自己的政策，如：免稅優惠、金融去管制化，更重要的是「阻止通過」保護勞工或者促進重分配的立法。¹¹ 對政策制定者來說，回應中位選民（與社會團體）並不重要，他們必須迎合有力的特殊利益團體和資本家，以換取其政治上的支持，包括政治獻金、選舉動員及媒體效應等方面。甚至，政治家常常本身就出自於大企業。

作者指出美國組織團體的變化導致不平等的惡化，這些變化包括：大型公司商會組織持續增加；兩大黨接受政治獻金數目大幅增加；能代表中產階級的利益團體持續減少，尤其是最能代表大眾在所得分配議題發聲的工會或貿易聯盟。過去三十年來，在全球化、服務取向的經濟中，資方的力量上升，但相應的工會法規未有改變，甚至反而對組織工會者不利，也沒有保護他們被隨意解雇的法規，因此工會日益消失，勞工加入工會的比例從 30.4% 下降到 12.5%，¹² 使工會的

¹¹ 作者舉出美國前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 Arthur Levitt 的形容，利益團體總能精準、快速的打擊任何威脅其利益的相關提案，即使是很小的威脅都不放過。參見 Hacker and Pierson (2010:66)。

¹² 書中資料為 2006 年數據。2010 年美國工會組織率繼續下降為 11.9%，若單看私人企業則為 6.9%，參見李仲辰 (2011)。美國眾院曾於 2007 年通過「員工自由選擇法」(Employee Free Choice Act)，讓員工較容易在組成工會，並處罰不當阻礙工會組成的企業主，但是該法案在參院已被阻擋數年，目前仍未通過。讀者若有興趣上網搜尋，可找到許多大企業積極遊說阻止該法案的新聞，例如 Wal-Mart。

力量減弱，更難以向政治菁英爭取保護勞工的決策。¹³

總結來說，Hacker and Pierson 認為若單以經濟因素來看，只能解釋部份的貧富差距，如果只有市場機制下的不平等，則不平等現象不會這麼嚴重。必須要加上整個政經體制的全面分析，才足以看清貧富不均的全貌。

六、99%大眾如何「逆風高飛」？

美國 Bill Clinton 總統著名的競選口號：「笨蛋，問題在經濟！」若套用在所得分配不均的問題，只能說是對了一半。真正的問題是在經濟力量與政治過程相結合的體制。整個政治過程、決策程序已經被由金字塔頂端 1% 的少數菁英所控制。從以上的四本書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學界對貧富不均現象的不同解釋，從經濟到政治層面，可以說是較完整呈現出分配不均的原因。然而，許多時候政府的做為、甚至一般民眾都會將貧富差距視為是「個人因素」所造成，因為新自由主義式經濟的思想已經根深柢固，整個政治經濟體制的結構問題仍然不受重視。

在不同的解釋途徑下，會有不同的改善處方，只是目前看起來還未有

一套有效方式能夠平衡傾斜的財富分配機制。首先，從經濟因素出發，Frank and Cook (1996) 對贏者全拿社會提出了幾個可能的改善方式。他們認為應該採行「消費稅」的方式，降低贏家所得到的報酬（同樣的價格能買到的東西價值減少）。不過此處仍有許多值得討論之處：第一，作者認為我們仍要維護個人自由與市場機制為經濟運作的核心，但是效率、自由與均等之間很難找到適合的平衡點，也就是說我們面臨一方面維持市場競爭機制又要限縮其中的贏家報酬的兩難。其次，消費稅的課稅方式是否影響到一般大眾的消費？降低贏家報酬的一小部份真的能對整個競爭分配機制產生多少影響？這些問題需要進一步的討論。另外作者也提出一些必要的改革，包括：高等教育資源的合理配置、媒體的改革、反托拉斯法、民事訴訟法的修訂（防止巨額訴訟費）等等，在各項經濟相關政策朝向均等分配做改革。在這樣的思考邏輯下，等於承認經濟上的自由市場機制、政治上的民主過程都不必然導致最佳的資源分配與政策，而有改進的必要。但這些政經改革必須透過政治過程有所啟動，但是在政治與經濟的互動之下，可能性不高。

Hertz (2001) 提出的解決方式是「消費者運動」，以消費者出發在市場上抵制惡質大企業（參見原書第七章），及提出要從企業手上「收復國家」（參

¹³ 實證研究可參考 Card (1998)，他指出工會數目減少使所得不均的現象加重 10%至 20% 之間。

見原書第十一章），幾項重要的作法包括：制定政治獻金法讓企業與政治人物之間關係透明化，防止政治人物被收買；停止從柴契爾夫人與雷根開始的「由上往下分配的經濟」及劫貧濟富的政策；政府必須把攸關重大民生的事業收歸政府管理。也就是說，她希望能破除「經濟實力—政治—貧富差距」這樣的線性關係。不過，若要以消費者運動、群眾力量去抵制大企業，我們怎麼知道哪些企業是壞的、哪些是好的？而且媒體多半控制在大財團手中，一般大眾大概只會得知企業的正面資訊。再者，國家的政策有許多不同面向，有些領域可能不一定與所得不均相關。

至於 Hacker and Pierson 所提出的解決辦法，如同 Lieberman (2011) 在 *Foreign Affairs* 上的評論所說：「兩位作者是很好的診斷師，但並非好的治療師。」我認為以上作者們提出的問題與解決方向都是正確的，但是仍然沒有說明該怎麼逆轉對中產階級不利的政治與經濟體制，而這是造成貧富差距最根本的來源。例如，Hacker and Pierson (2011) 提出的方案包括：推行改革時盡量減少來自政治經濟菁英的阻力；促進更多的政治參與；鼓勵發展更多能代表中產階級的團體，讓它們能監督政府及政治過程。要做到這些目標，必須要持續對立法者施加壓力，組織工會是最重要的第一步，還要利用現代科技（例如網路）讓政

府資訊及政策制定過程公開透明化，最終仍需靠組織及大眾的動員。作者認為隨著整個政經體制危機的浮現，必須要有具有遠見的政治人物去帶起相關的討論，讓改革的能量慢慢累積（keep the pot of reform simmering）。

我們都知道這些議題的重要性，要對政治人物施壓，但是一般人仍然很難對既有的金權政治有所影響，無法撼動擁有眾多資源的組織性利益，而中產階級要動員並且形成有力量的組織則很困難。政治層面的修補方法很難啟動，經濟層面也是如此。例如 Frank and Cook 所提出的種種經濟及政策改革建議，或者是像許多經濟學家強調從分配面的後果提出修補方案固然是有利消除不平等的做法，但是在現行的政經體制下行政與立法部門通過類似的法案可能性很低，而且也無法處理資本主義經濟中固有的各種矛盾。

現今自由市場的邏輯已經根深柢固。或許，我們大概只能期待有愈來愈多的輿論力量（由教育家、意見領袖、公民社團、甚至是改革派政治人物等行為者帶頭），用選票去影響公共政策；而學界也必須提出更進步的經濟與政治方案供世人選擇，像市場社會主義、經濟民主制。¹⁴ 觀念的改變需要長時間的醞釀，正如同「贏者全拿政治」是作者所說的 1970 年代至今

¹⁴ 有關市場社會主義相關討論可參見姚欣進 (2010a; 2010b)。

「三十年戰爭」才慢慢形成。99%的大眾已經發起反擊的號角，若愈來愈多人注意到不平等的嚴重性，才愈有可能迫使政治菁英作出改變。¹⁵

參考書目

- Bartels, Larry M., 2008. *Unequal Democrac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Gilded Age*.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ard, David, 1998. "Falling Union Membership and Rising Wage Inequality: What's the Connection?" NBER Working Paper No. 6520, Cambridg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Available at: http://www.nber.org/papers/w6520.pdf?new_window=1.
- Frank, Robert H. and Philip J. Cook 原著，席玉蘋譯，1996 第一版。《贏家通吃的社會：當前就業與市場的現實面》，臺北：智庫出版。
- Gitlin, Todd, 2011. "The Left Declares Its Independence", *The New York Times*, Oct. 8th. <http://www.nytimes.com/2011/10/09/opinion/sunday/occupy-wall-street-and-the-tea-party.html>

¹⁵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 Cornel West 於佔領華爾街現場接受訪問時指出：「這場運動的意義不是討論具體政策建議，而是一場『民主覺醒』(democratic awakening)」；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Todd Gitlin(2011)指出：“Anger does not move countries, but it moves movements — and movements, in turn, can move countries”。

- Hacker, Jacob S. and Paul Pierson, 2010. *Winner-Take-All Politics: How Washington Made the Rich Richer--and Turned Its Back on the Middle Clas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nc.
- Hertz, Noreena 2001. *The silent takeover: 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death of democracy*.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許玉雯譯，2003。《當企業購併國家：全球資本主義與民主之死》，臺北：經濟新潮社。
- Krugman, Paul, 2007. *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 New York: W.W. Norton & Co. 吳國卿譯，2008，《下一個榮景：政治如何搭救經濟》，臺北：時報出版。
- Lieberman, Robert C., 2011. "Why the Rich Are Getting Richer: American Politics and the Second Gilded Age". *Foreign Affairs*. Vol.90. 154-III.
- Waldman, Michael, 2003. *My Fellow Americans: The Most Important Speeches of American Presidents, From George Washington to George W. Bush*. Naperville, IL: Sourcebooks.
- 李仲辰，2011，〈影響美國工會組織權之《勞工自由選擇法案》介紹〉，《臺灣勞工季刊》，第 26 期。
- 姚欣進，2010a，〈尋找另一條可行的道路--市場社會主義 1〉，《立報》，2010 年 7 月 1 日。
- 姚欣進，2010b，〈尋找另一條可行的道路--市場社會主義 2〉，《立報》，2010 年 7 月 15 日。

Disaster Policy and Politics: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Homeland Secur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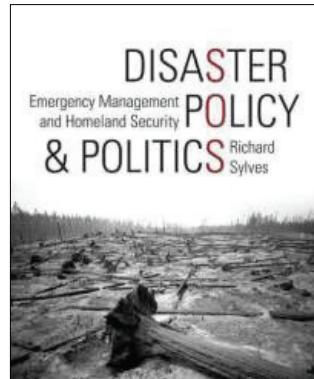
左宜恩 /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博士生

一、前言

經濟高度發展的現代國家，在面對全球氣候變遷、恐怖襲擊陰影籠罩之變局下，如何有效提昇防救災工作之效率，降低各項天然及人為災害對社會安全的威脅以及對國家競爭力的損害，已逐漸成為學界、實務界關心之重要議題。執政者若能有效因應、處理各項重大災害所帶來之衝擊，不但可鞏固國家競爭力於不墜，更可凝聚民眾向心力、有助於維持社會安定，確保政權穩定。因此「災害政治學」不但成為政府領袖們所必修之專業課題，更可協助吾人透過政治學，乃至於公共行政角度出發，剖析當前政策優劣得失，成為提昇治理成效之利器。長久以來，災害政治學已成為美國政治運作之重要一環，歷經九一一恐怖攻擊、卡崔娜颶風（Hurricane Katrina）洗禮，防災相關議題的重要性日益彰顯，成為公共行政學界研究焦點之一。本書作者即以結合政治學與公共行政之角度出發，深入剖析當前美國聯邦與地方防救災制度及其施政成效，佐以若干案例分析，梳理出一套更具全面性與可行性，有效提昇治理效能之良好制度。

二、章節介紹

作者從公共行政學以及公共政策角度出發，著重於如何藉由促進良好府際關係以有效提昇整體防



作者：Richard Sylves
出版者：CQ Press
出版地：Washington,
D.C.
年份：2008
頁數：232 pages
ISBN：9780872894600

救災施政成效之探討，分析各級（中央與地方）政府在應對災害時所可能面臨的各項挑戰及其因應之道。本書四大主軸為：一、當前美國防救災制度之現況研究；二、災害政治學及相關政策之探討，分就政治學、公共行政、社會學及經濟學等理論切入，瞭解當前學界如何藉由相關議題之研究，影響相關政策之作成；三、民選首長於防救災政策中扮演的角色，就府際關係、中央與地方權責劃分等面向進行探討；以及四、文武關係與國土安全，探討軍隊所扮演的角色，並論述美國政府如何將防救災與國土安全概念予以結合，形成全新之政策領域。

立基於四大主軸，本書第一章針對美國防救災制度進行剖析，就歷史演進、重要概念（例如著名之「防災四階段論」：將防災工作分為減災、備災、救災以及災後復原等四階段）、學界相關研究等進行介紹。第二章則提出若干可用來從事政策分析之理論基礎，並探討組織文化、官僚政治等變項是如何型塑當前防救災政策之作成。第三章則進行歷史回顧，論述自杜魯門總統至小布希總統時期，重要的法案與政策內容，使讀者能對當前制度背景以及防救災專責機構：聯邦災難管理總署（FEMA）有所瞭解。第四章則論述總統的行政權：逕行宣告當地為聯邦災區（Presidential Disaster Declaration）。作者認為，分析總統如何行使該項權力，有助於我們瞭解政

治力是如何介入各項防救災工作，並影響政策制定。第五章則探討不同學界（基礎科學以及社會科學）對防災相關研究所作出的具體貢獻。作者指出，學界已然成為政治上一強大「利益團體（interest group）」以爭取政府更多經費與研究補助從事防災相關研究。第六章則從府際關係的角度出發，分析各級政府在從事相關政策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互動。第七章針對軍方在防救災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進行論述，同時，就當前美國政府將防救災納入國土安全政策領域之現況加以分析，探討自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政府對反恐行動的重視，對原有之防救災工作產生何種影響？本書第八章乃從比較的觀點，闡述在全球化的國際政治舞台中，美國政府如何與各國政府、國際組織（例如聯合國）合作，進行區域、全球性的跨國防救災合作計畫。最後於第九章做出結論，並就未來政策發展走向進行預測，針對當前制度呈現出之優劣得失提出建議，以企圖建立一更具回應性與效能之政策架構。

本書尚有副標題：“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Homeland Security”，則顯示出當前美國防救災制度乃與國家安全政策高度結合，重大天然與人為（科技災害、恐怖攻擊等）災害具有同等重要性，不可偏廢。本書除主要以論述當前防救災制度與政策外，更將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後，對國土

安全之重視，例如軍隊與地方政府合作打擊恐怖份子、處理恐怖攻擊事件等面向，乃至於如何透過修法、制定政策等方式，強化美軍參與國內防救災工作之角色與重要性等方面加以評析。

三、評論

雖然臺灣所採行的防救災制度與政策多半為習自鄰國日本之例，但事實上美國無論在從事防救災工作，以及制度發展上均為世界先進，其豐富經驗仍值得我國效法、借鏡。因此近年來我國政府也開始仿效美國，進行若干組織與政策改革（例如行政院仿照美國聯邦災害管理總署之例，設立中央層級之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協助中央辦理各項防災工作）。從本書所提供之美國應對各項重大災害之教訓中，可提供我國寶貴經驗參考，有助於藉由見賢思齊、鑑往知來之助，成功提昇我國災害防救之能量與施政成效，確保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維持社會穩定。作者於書中所提出之若干論述，亦有值得吾人所深思者，或可成為未來我國從事制度革新時，所可參考的重要依據，試討論如下：

長久以來，臺灣人民普遍認為：防災工作為政府天職。但本書作者從經濟學角度出發，認為政府是為了彌補市場經濟之不足，因此才介入其中，提供防救災相關服務與資源。美國的

防災工作奠基於「由下而上（bottom-up）」模式，防救災工作主要供應者為位處第一線之地方政府，而非中央。唯有災害規模已超出地方政府所能負擔之能力範圍時，方可請求上級政府予以協助。但若中央政府經評估，認為地方政府平時有疏於從事防救災基礎建設之情事，則可依法拒絕給予補助。此一制度設計，對照當前臺灣地方政府動輒以經費、人力不足等理由，平時疏於防範，受災後則完全倚賴中央進行各項防救災工作之情形，似乎提供若干啟發，如何針對現有法令條文進行修正，以同時提供誘因與懲戒，雙管齊下之政策鼓勵地方政府採取更為積極的態度從事具體作為，值得政策制定者加以深思。美國聯邦政府平時扮演著指導角色，並不直接介入地方從事各項防救災準備工作，但鼓勵各地方政府爭取聯邦預算補助，並建立地方聯盟合作網絡，以強化地方防救災工作之能量。一旦地方遭受重大災害襲擊，超出其能力負擔範圍外，則可依法逐級向上級（州及聯邦）政府求援，經州政府審核通過並宣告為州級災區後，即可在州政府官員的協助下，向聯邦政府請求總統宣告為聯邦災區。經過聯邦官員（FEMA）審核後認有必要，即建請總統逕行宣告為聯邦災區，聯邦政府則可直接調派人力物力進駐災區，協助各項搶救工作，同時給予特別補助，進行各項復原工作，有效紓解地方財政與人力資源困境，加速災後復原工

作效率。除此之外，如何有效引入市場經濟力量，鼓勵民間業者提供災害保險之方式，協助民眾分攤災害風險，將可有效提昇人民防災意識、降低致災可能以及縮小受災損失，有助於節省政府施政成本，提昇行政效能。如此的制度設計，一方面可避免地方政府平日怠惰，受到災害襲擊後便將責任推給中央，由中央負擔各項防救災工作，增加中央政府負擔。同時亦鼓勵各地方政府於平日與鄰近地方建立互助合作聯盟，於災害發生後第一時間就近獲得援助，有效提昇搶救工作之效率，值得我國從事現行制度改革時加以學習、參考。

2009年8月莫拉克颱風侵襲全台，所造成之重大生命與經濟損失，也引發民眾對於政府救災效率之不滿。輿論則有主張：應仿效處理九二一大地震之前例，由總統發佈緊急命令，以協助行政機關擺脫現有法令規章之限制，得以更有效率地從事各項救災與災後復原工作。然而馬英九總統則以「災害防救法」已有完整規範，無須另行頒布緊急命令此一理由，拒絕行使此一總統職權，因而招致輿論批評，形成政治危機。美國災害防救法令則賦予總統宣告聯邦災區之權，一地若經總統宣告為聯邦災區，則可獲得額外之補助，並賦予聯邦政府跳脫原有法令規範，可逕行提供各項人力物力等資源補助，加速救災工作進行、有效提昇施政效率與回應性。然而總統

並非獨斷行使此項權力，而需經由層級節制之行政程序，地方政府需透過上級(州)政府，並經聯邦機構(FEMA)評估，認為地方政府已窮盡能力，未有任何平日疏於防災、行政怠惰之實，方可建請總統宣告為聯邦災區，提供各項援助。在這一道道關卡中，政治力的運作舉足輕重，學界亦有探討，認為政治力的不當干涉（總統與地方分屬不同黨派時，政黨政治的操縱）可能會影響總統決策作成。然而如此設計，乃將我國現行之緊急命令制度內含於災害防救法規中，當我國再度面臨有如莫拉克風災類此狀況時，似乎可作為有效提昇救災效率之良方。

源自於美蘇冷戰時期對核子戰爭的預防與恐懼，「國土安全」議題長久以來一直與美國防災政策緊密結合。運用軍事力量預防或打擊襲擊美國本土之恐怖攻擊行動，亦為防災政策之一環。尤其在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後，重新喚起美國國內對於國家安全之重視，聯邦政府將 FEMA 納入新成立「國土安全部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DHS)」之下，接受 DHS 指揮調度，即可見一斑。而軍方於國內防救災工作任務與重要性也逐漸提昇，除傳統上接受各州州長自行調度指揮之國民兵 (National Guard) 系統外，美軍也加入地方政府從事打擊恐怖份子以及處理恐怖攻擊事件等重要災害防救工作。面對天然災害襲擊時，受災地區一旦經總統宣告為聯邦災區，

總統即可直接下令美軍進駐當地，協助地方政府從事各項災害搶救與災後復原行動。小布希總統更於2005年卡崔娜颶風造成重大傷亡以及財產損失後，宣示此後美軍將逐漸強化其協助防救災工作此一任務，使軍方成為強有力的合作夥伴，與各級政府、民間組織構築成更具全面性之防救災政策網絡。我國國軍長久以來，一直在防救災工作中扮演舉足輕重角色，然而相較於美國，我國地方政府雖無類似

「國民兵」之設計，可供地方首長指揮調度作為防災第一線行動者。但龐大的後備軍人系統，也鮮少加以妥善利用，此點似乎可作為我國未來政策規劃時所應考慮之處。

我國雖仿照FEMA之例，成立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作為處理相關工作之中央專責機關，然而因於預算、人力以及法令規章（總員額法等）等因素，行政院災防辦其規模及權限仍遠不及FEMA，主要功能仍以協助中央行政首長（行政院長）辦理各項防救災工作、進行指揮調度之用。此與我國防救災制度設計之初，主要參考日本（現有行政機關人員兼職為主），而非美國（成立專責部門，擁有獨立預算與人力）模式有密切關係。因此我國現行體制似乎開始朝向美、日混合之方向邁進，但此舉是否反而容易混淆原有機關、人員之職責與權限劃分？仍有待觀察與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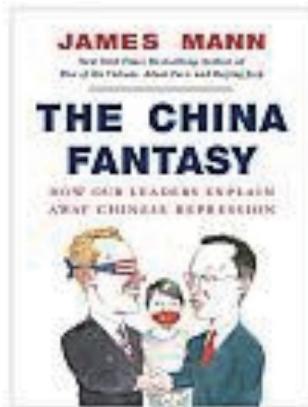
綜合上述，此書除闡述美國當前防災制度、政策於政治面之實際運作情形外，更提供不少值得我國政府在從事制度、組織革新以及政策制定時的重要經驗參考。並且亦就未來學界從事相關研究中所可切入的各面向進行介紹，對我國當前仍在萌芽階段的防災學術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訊，使本書無論在理論與實務上，均具有高度的可讀性及參考性，提昇其學術與應用價值，值得一讀。

The China Fantasy: Why Capitalism will not Bring Democracy to China

徐子軒 /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生

自美國與中國關係正常化以來，美國對於中國一直存在著不切實際的幻想。孟傑慕（James Mann）（2007：1-7）認為可以歸納出兩種，一為寬心情境（soothing scenario），二為劇變情境（upheaval scenario）。前者大部分存在於美國決策菁英之間，是指在美國設想的場景裡，中國透過與全球的貿易往來與各國交往，最終將改變共產黨政權，使中國走向民主自由之路，這可從臺灣與南韓的亞洲經驗佐證。從尼克森以降到小布希，歷任的美國總統都是以此宣傳並爭取美國人民信任。後者是由於中國內部貧富差距日殊，社會動盪漸趨激烈，因此共產黨可能會失去控制能力，使中國面臨崩潰或解體。這是從中國面臨許多社會抗爭所得到的預測，大部分則存在於反對中國的人士之間（2007：8-10）。不過，孟傑慕認為無論是寬心情境或劇變情境，均屬於一廂情願式的思考（wishful thinking）。原因在於第一種情境無法解釋中國領導人為什麼能被說服放棄權力，第二種情境則小覲了共產黨對於中國的掌控。因此他提出所謂的第三種情境（2007：10-21），也就是中國將維持現狀的觀點。在第三種情境中，中國將持續發展經濟，共產黨也將繼續鎮壓威脅政權的政治反對者，並繼續監控社會各領域。

孟傑慕進一步論述（2007：49-54），他認為星巴克或任何資本主義式的跨國企業，進入中國便會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屬於一種荒謬的假設。因為中國



作者：James Mann
出版者：Penguin Books
出版地：New York
年份：1981
頁數：154 pages
ISBN：9780143112921

人即使吃著美式食物，也不代表他們接受了美式思想，更與共產黨政權是否有決心促進民主化毫無關係。另外，中國有許多新興中產的階級，這些人也不一定會是推動政治改革的內部動力。儘管許多人對共產黨不滿，卻沒有真正改變的意志，一來是因為沒有公平開放的選擇機會，即使目前有一些基層選舉，卻也是共產黨用以裝飾其專制的方法；二來是因為共產黨在中國人民的心中仍具品牌價值，因為共產黨可以帶動經濟持續發展，也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的地位，三來是因為中國自共產黨建政以來歷經太多政治運動，人民普遍對政治冷感且抗拒。這些現象都顯示，中國內部並不存在民主化的條件，反而是以穩定共產黨政權為當下的主流。另一方面，孟傑慕（2007：105-108）表達出他對美國現有中國政策的不滿與憂心，他質疑究竟是美國整合了中國，使之進入以西方價值觀為主的國際社會（民主社群），還是中國整合了美國，使之同意一個不以西方價值觀為主的新國際社會（多元社群）？他更指出，這種整合政策讓美國的藍領階級失去了工作，獲利的只有中國與美國的政商菁英。孟傑慕（2007：110-112）並將2008年的北京奧運認為是一個重要的觀察點，認為在此後將出現他設想的第三種場景，亦即共產黨順利延續其專制政治，故美國應該改弦易轍，將經貿和政治脫鉤，放棄經濟發展就會帶來

民主化的迷思，更積極地來推動中國政治改革。

綜觀全書，可以發現孟傑慕站在道德制高點上，以美式民主大纛主張要改變中國，這恐怕也是另一種的美國幻想（America fantasy）。筆者認為就意識形態來說，西方先進國家相信，只要接觸或整合中國，西方的民主、自由等價值觀遂可以滲透中國，一則讓中國學習普世價值，二則可能可以達到改變中國政治體制的成果。若是中國逐漸民主化，那麼中國的行為也將合乎民主國家標準，不只能成為西方國家真正的夥伴，更能防止衝突的產生。但孟傑慕卻忽略了中國長久以來的觀點：中國一直認為美國具有帝國主義的野心，想要藉著民主制度顛覆國家，這不僅涉及到共產黨的存亡，更觸及中國於清末被列強侵略的歷史創傷。再者，美國的民主化戰略有時言行不一，為了國家利益往往可以跟某國的獨裁者合作（例如，為了中東世界的能源利益，可以不顧其人權紀錄），這樣便坐實中國對於美國有兩套標準的說法，中國理所當然認為所謂自由民主，只是西方用來約束中國的遊戲規則，並不是經過其他文明同意的普世價值。由目前實踐觀之，美國（及其盟國）的整合中國戰略可說是成功了一半。這是因為雖然沒有達到令人寬心的中國民主化，但亦漸漸成功地讓中國融入國際社會。

就現實利益來說，中國現在是全球化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且可能很快就會成為第一大），接觸或整合中國在經濟上可以得到甚多的好處，絕對是各國決策者的優先選項。又，世界各國的領導多半相信，整合中國不只對本國經濟有好處，亦能保障國家安全。因為一旦中國與國際社會緊密結合，就會產生所謂相互依賴的效應，也就是說，中國如果要對他國動武，本身也會受到損失，甚至危及共產黨政權，故，中國不會輕啟戰端，這等於是一種嚇阻的作用。此外，中國積極倡議國際關係民主化，認為在國際社會裡唯有更多元的聲音才能弭平爭端，達到較為公平的狀態，這當然為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所不樂見，儘管這部分仍在爭議當中，中國依舊不斷的藉由權力的提升，逐步擴充在國際政治上的影響力，卻也坐實了孟捷慕認為事實上乃是中國整合了美國的看法。

另一方面在中國內部，許多民主倡議者已經失去耐心，因為他們發現中國雖日益強大，共產黨政權仍然不願進行大幅度的政治改革。換言之，經濟的發展並沒有帶來民主化的契機，反倒是讓共產黨政權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重新穩固執政的合法性。此外，中國民間充斥著民族主義的聲浪，這些民族主義者為了國家的尊嚴，頑固地抗拒西方，將民主化視為是西方干涉中國內政的陰謀。漸漸富裕的中

產階級亦有著犬儒心態，他們或許希望擁有一些自由，但更不欲見到因為政治改革所引起的社會動盪，這可能會讓他們失去財富與地位。當然中國仍有少數民主鬥士，像是民運人士、維權律師與非政府組織，依舊嘗試衝撞共產黨體制，試圖找到發揮的空間，但這些人在整個中國來說是少數中的少數，且受到共產黨的嚴厲打壓（如最負盛名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迄今仍身陷囹圄），難以發揮影響。再者，中國的公民社會雖在發展當中，但由政府主導的色彩濃厚，行動多所限制，與西方蓬勃的社會運動不能比擬，更無政治上的發言權。

以臺灣為例，可以發現在民主化的路上有中產階級的助力，然而這些中產階級願意投入或協助政治改革，乃是因為他們具有自由-理性的全球文化思維。這是民主價值觀的擴散所致，特別是西方民主中的反對文化，使他們勇於要求民主化，甚至影響到統治階級，讓統治階級較能接受變革或政權轉移的可能。雖然中國正興起大量的中產階級，但卻仍不見其民主化的契機，這主要是因為中產階級並未具有西式的價值觀。中國雖然進行了改革開放，但在意識型態上仍有著嚴格的箝制，鼓吹民族主義做為思想武器，並主張全球多元化，以對抗西方民主、人權與自由等文化。

需注意的是，民主化的歷史經驗

與理論都顯示，如果決策菁英沒有做為改革的重要動力，那麼此國極難進行政治變革，除非透過極大的社會抗爭（可升級為革命）或外國勢力的入侵。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的決策菁英仍是以共產黨為骨幹，這就注定了體制的牢不可破，此亦為孟傑慕此書最主要的論點。其次，外國勢力的入侵不但極不可能，且反會激起中國的團結，更不利於民主化，亦為無理之舉。那麼，剩下最有可能的就是社會抗爭，眾所皆知，中國近年來因貧富不均與司法公義問題，常常出現大小不等的抗爭運動，而中國官方也深知野火燎原的危險性，靠著優越的國家統治能力，或逮捕或封鎖，總是能將這些抗爭的損害減到最小。但，對於這些抗爭是否有一天能夠突破官方的力量，成為中國民主化的主要動力，也沒有人可以準確預言，唯一能確定的是，不管是從西方或是中國政治發展經驗觀之，這種方式所帶來的民主化都會有危險，它可能會導致中國內部的動亂，進一步影響到區域的安全與國際的利益，卻是中國一條可行之路。畢竟，無論任何一國在進入民主政治之前，均需要經過陣痛（差別者在於陣痛的時間與強弱），才能真正擺脫過去的政治陰影，走向更為開放的自由。這，或許是第四種場景。

中國的衝擊

張鈞凱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一、前言

溝口雄三（Mizoguchi Yuzo, 1931-2010）教授，是晚近日本中國學研究相當重要的學者。溝口的學術研究從中國傳統的思想出發，強調思想史、社會史、政治史與經濟史等跨學科的合作，這個嘗試表現於他的成名作《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演變》。溝口教授在學界引起最多討論的著作，當屬《做為「方法」的中國》一書，他在書中以比較的視野，探討如何以中國為研究主體，並透過中國來理解日本，進而提出了「多元世界史的史觀」。

溝口教授曾在大陸、臺灣與美國擔任訪問或客座學人，2010 年逝世之前亦積極參與《臺灣社會研究季刊》所舉行的東亞知識社群對話。本文評論的《中國的衝擊》（以下簡稱《衝擊》或「本書」），日文原書出版於 2004 年，是溝口教授逝世前最後的著作。

二、為什麼要談「中國的衝擊」？

相對於溝口早期論理性質很強的學術作品，出版於 2004 年的《中國的衝擊》，主要收錄 1990 年代中期以後至 2002 年中間的文章，內容較為偏向時政評論。但是，《中國的衝擊》不能單獨閱讀，必須連結溝口一向的主張「以中國為方法，以世界為目的」來理解，也就是溝口的中國學，其最終關懷與對話的對象是日本。否則，縱覽《中國的衝擊》全書，



作者：溝口雄三

譯者：王瑞根

出版者：北京三聯

出版地：北京

出版日期：2011

ISBN：9787108036230

容易誤以為溝口談的僅是「中國崛起」或「中國威脅論」等議題。從溝口另一本名著《作為「方法」的中國》來看，他反對日本學界長期以來「沒有中國的中國學」，也就是忽略中國歷史自身的現實與脈絡。但溝口也不僅僅只是要合理化或肯定中國的特殊性，因而也反對竹內好將中國稱為「獨特的近代」，或是西順藏戴著有色眼鏡透過否定歐洲的「中國停滯論」來尋找中國。在竹內好或西順藏的脈絡下，中國的特殊性將會成為「西方中心論」的複製品，中國只是取代西方成為另一個「典範」或「世界」。而溝口對日本學界「沒有中國的中國學」的批判，事實上已經摒除了「東西二元對抗」的模式，因為這種模式仍然是以西方為衡量標準，潛台词就是仍將西方規定為「世界」，透過對西方的批判，溝口認為依舊無法找到真正的中國「原理」（孫歌，2010：475-477）。

簡言之，溝口的中國學，就是希望一開始便使用「中國的視角」來認識中國，並且跳脫西方的視野，回歸東亞的內部。但溝口並非要把東亞一體化，而是東亞各國都有各自的特殊性，日本必須要看清楚中國做為一個「自我完滿的整體」的特殊性與現實，才能看清楚日本自身的特殊性與現實。故此，「作為方法的中國」，可以理解為認清中國的現實，而溝口的終極目的，就是要從他者返回自身，透過承認他者的現實，來找尋自身的現實意義。

連結回本書的問題意識，溝口所謂的「中國的衝擊」是對日本自身而言，並非泛論對中國周邊國家的衝擊。中國所帶給日本的衝擊發生在經濟、政治、歷史、知識與文明各方面。歸根究柢，溝口認為日本沒有意識到中國在位置上相對於日本的上升局面，而這個現象正是由於日本人仍沉醉在傳統「日本優、中國劣」的認識框架，因而這種不自覺便導致「中國的衝擊」的印象。

因此，「中國的衝擊」與日本不自覺的「日本優、中國劣」的認識框架是一體兩面，先有日本對中國的優越與蔑視，遂有「中國的衝擊」的問題。本書就是溝口企圖打破日本傳統的認識框架，進而才能解決對日本而言的「中國的衝擊」。

三、西歐中心近代化史觀的反省

為了打破日本的「中國的衝擊」，溝口認為有兩個途徑，一個是要先反省日本效法西歐中心近代化史觀而來的「亞洲優等生」觀念；另一個就是要重新認識中國的歷史與現實，才能重新定位與認識日本自身。

溝口指出，日本的近代化史觀與脫亞論史觀是一體的兩面，在此史觀之下，很容易將「歐化」的速度與「文

明優劣」相繩在一起，認為歐化速度愈早就愈先進，速度愈慢就愈落後。因此日本普遍認為日本較為優秀，而中國相對就是「劣者」。

忽略各地區自身歷史脈絡的單一西歐中心近代化史觀，相當程度還是停留在冷戰思維，使得日本在面對中國的發展時，對中國採取「偏見」與「歧視」的立場，也對中國抱持著「沒有根據的優越感」（頁258）¹。例如溝口特別指出，日本將西方的民主標準套用在中國身上，因而先驗、不加論證地認為現在的中國政府是「反民主」與「反自由」（頁9）。

但是溝口的目的不是要去證明中國的特殊性，而是認為因為日本傳統追隨西歐中心近代化史觀而來的「亞洲優等生」觀念，將中國與日本都擺進歐洲的近代化過程，這個作法無法認清中國的歷史發展道路與西歐是不同的，因而也就無法理解真正屬於日本自身的發展道路。

四、「深入到中國歷史中去」

溝口在書中提出了「深入到中國歷史中去」的作法（頁254），例如本書第二、三部分都是溝口深入地重新理解中國歷史的嘗試。此處必須特別提醒讀者，溝口所謂「深入到中國歷

史中去」其實就是「以中國為方法」，充其量只是藉此來認識日本自身的「方法」。

首先，溝口指出過去一般認為辛亥革命的爆發，是因為中國受到西方船堅砲利的衝擊。但溝口認為這種說法只是歷史的「橫斷面」，不是歷史全貌。以本書第六章〈辛亥革命再思考〉為例，溝口指出辛亥革命不是突然爆發的，辛亥革命所代表的社會革命道路，可以上推至16世紀明代的鄉村自治、清代的省自治與洋務維新運動，是中國歷史往地方分權發展的結構。辛亥革命與其後的中國革命也有內在的歷史連續性，辛亥革命沒有建立起的統一體制，最後在新中國的成立而完成。

其次，在本書的第八章〈禮教與中國革命〉與第九章〈另一個「五四」〉（頁129-194），溝口則試圖去商榷自五四運動以來，將「禮教」簡化為一種「扼殺人性的上下尊卑秩序」（孫歌，2010：469）。溝口指出，「禮教」與「禮治」的觀念，同樣可以上溯到明清社會，它代表的是鄉里空間的秩序規約，所彰顯的則是相互扶持的歷史功能，因此溝口認為毛澤東所領導的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其性質正是延續、繼承了中國傳統相互扶持的要素，以及禮治的秩序規範，甚至指出「中國革命就是鄉約的全國規模的版本」（孫歌，2010：470）。

¹ 括號內的頁碼，即《中國的衝擊》中譯本的頁碼。以下皆同，不另作註。

透過對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禮教，以及其後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檢視，溝口要表達歷史是不斷流動的動態發展，是「橫斷面」與「縱斷面」的交相作用，並非西歐中心的近代化史觀，將歷史以「傳統」與「近代」二元分立這般簡單。在溝口的中國歷史敘事中，關鍵的時期是 16、17 世紀明清鄉里空間的發展，不只是影響了其後中國政治觀與秩序理念的發展，同時也影響了中國對「私有」的認識。「私有」通常是指宗族內部的「公平共有」，這個概念一直延續到太平天國「天朝田畝」制度、孫中山的平均地權主張，再到毛澤東的土地國有政策（頁 76-77）。

溝口在書中以很大的篇幅來論述中國特有的歷史脈絡，他以深入中國的歷史脈絡做為「演示」，說明中國有自身的發展軌跡，而日本不必將中國視為「世界」，也不必戴著中國的眼鏡或以中國為媒介來認識自己（頁 9）。² 認識中國，應該以「中國的視角」出發；同樣的，理解日本自身，也應該以「日本的視角」出發。

五、結論：全書總評

溝口雄三在 2004 年出版的最後一本作品《中國的衝擊》，一方面可視為

² 作者以中日兩國不同的歷史脈絡與觀念的差異，來論述中日近代化道路的不同，更深入的討論可參見：溝口雄三（2011b）。

他對時政的評論，另一方面則是他的中國學方法論的延續。本書分為三個部分，分篇討論了日本「先進 vs. 落後」的史觀與價值觀、歷史思維、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社會主義革命等等不同的問題，但溝口的思維是一貫的，也就是回到「以中國為方法、以世界為目的」方法論下的討論。

溝口的學生孫歌³曾說過，溝口以畢生的研究來追問：「中國這樣走到今天，它的優勢它的劣勢、它的成就它的代價，究竟有什麼樣的內在邏輯？而我們到底應該使用什麼樣的標準去評價這一切？」（孫歌，2010：463）在溝口眾多的作品中，溝口一直以歷史的「橫斷面」與「縱斷面」交互作用來看待中國的歷史發展，認為中國的歷史沒有斷裂，中國歷史有自身的脈絡與現實，類似的方法在《中國的衝擊》也表露無遺。

但是溝口的中國史論述，其實只是一種「方法」，他的目的還是世界史的視野。溝口雄三提出的「深入到中國歷史中去」，一方面把中國特殊化，另一方面透過此媒介將其他地區特殊化，「在這樣的集合多元特殊化的前提

³ 孫歌畢業於吉林大學中文系，日本東京都立大學法學部政治學博士，目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主要著作有：《竹內好的悖論》（2005，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亞洲意味著什麼：文化間的「日本」》（2001，臺北：巨流圖書公司）等書。孫歌教授主持「溝口雄三著作集」在中國大陸的翻譯與出版，全集共八冊，預計 2012 年出齊。

下結構『世界』圖景」(孫歌, 2010: 478), 也就是溝口在本書中不斷主張的「歷史多元主義」。

因此，溝口的方法論，以及對日本當前認識框架的反省，易言之，就是透過他者來看自己。過去日本學界「沒有中國的中國學」，就是與中國的現實脫節，而日本一向「日本優、中國劣」認識框架，帶來了「中國的衝擊」的憂慮。唯有正視中國的現實與特殊，才能破除日本的認識困境，進而看清屬於日本自身的現實與特殊，以緩和甚至是消弭「中國的衝擊」。

通覽本書，溝口以其特有的方法論，結合了當前中國大陸的發展態勢，為日本的學界與社會提出了警語，希望日本能夠回到「現實」。透過回到中國的「現實」，進而回到日本自我的「現實」，否則「中國的衝擊」將會愈來愈嚴重。

溝口的方法論是經過反省而出的產物，儘管他的對話對象是日本學界與社會，但是他的方法論也提醒我們，各個地區自身歷史脈絡的重要。因此他書中所指稱日本「中國的衝擊」，不必然表示中國大陸周邊的地區或國家會有同樣的「中國的衝擊」，必須回到自身的現實，才能釐清自身的問題所在。

參考文獻

- 石之瑜, 2008,〈斷代與斷裂：日本近代中國認識的基礎脈絡〉，《日本近代性與中國：在世界現身的主體策略》，臺北：國立編譯館，頁29-59。
- 孫歌, 2010,〈送別溝口雄三先生〉，《臺灣社會研究季刊》，79: 441-481。
- 溝口雄三，王瑞根譯，2011a，《中國的衝擊》(譯自：中国の衝撃)，北京：三聯書店。
- 溝口雄三，鄭靜譯，2011b，《中國的公與私・公私》(譯自：中国の公と私・公私)，北京：三聯書店。
- 溝口雄三，林右崇譯，1999,《做為「方法」的中國》(譯自：方法としての中国)，臺北：國立編譯館。
- 溝口雄三，林右崇譯，1994,《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演變》(譯自：中国前近代思想の屈折と展開)，臺北：國立編譯館。

【《政治科學季評》招募編輯與審稿委員】

各位讀者您好，創刊至今已超過 32 期歷史的《政治科學季評》，每期皆有來自包括比較政治、公共行政、國際關係、政治哲學與思想、（歷史）社會學、文化研究、社會科學方法論.....等不同領域的書評或書目稿件。著眼於《政治科學季評》是一份由師生共同組成的投稿與審稿園地，這些稿件的審查和編輯歡迎且需要您的支持與襄助。

因此，若您有興趣加入季評審稿和編輯行列的話，請至以下網址填寫資料：<http://0rz.tw/mvpSJ>。未來，我們會視投稿文章屬性與您的專長和興趣領域，安排稿件給您審查。謝謝您熱情參與。若有任何疑問，請聯繫季評專屬工作信箱：poliscireview@ntu.edu.tw，謝謝！



【政治科學季評第 34 期徵稿啟示】

□能對當代政治學知識發展與時俱進，提升並促進學術之反省對話，推動華文政治學相關系所之學術參與及交流，本刊公開徵求對政治科學相關學術著作之「書評」與「書目」，期許引領暨提升學術研究之風氣。

投稿須知

- 徵稿對象：政治科學相關系所師生
- 稿件內容：
 - (一) 短篇書評：針對政治科學相關中外文學術著作之評論（其中至少應有二分之一以上篇幅作為內容引介），約 2000 至 2500 字。
 - (二) 長篇書評：針對三至六本政治科學相關中外學術著作之綜合評論，約 5000 至 8000 字。
 - (三) 書目：針對政治科學相關學術著作之介紹，約 1000 至 1500 字。
 - (四) 讀者回應：對前期刊登書評之回應，約 1000 至 1500 字。
- 截稿日期：2012 年 5 月 1 日。
- 稿件筆潤：
 - (一) 短篇書評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壹仟貳佰圓整。
 - (二) 長篇書評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參仟圓整。
 - (三) 書目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柒佰圓整。
 - (四) 讀者回應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伍佰圓整。
- 注意事項
 - (一) 註釋及參考書目，請參考《政治科學論叢》體例。
 - (二) 請勿以考試用書、教科書、會議論文作為投稿內容。
 - (三) 稿件內容必須至少三分之一篇幅為評論。
 - (四) 本刊物嚴禁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規範的稿件，違者除稿件一率不予錄用外，並將以本編輯委員會名義寄發通知信函給投稿人所屬單位。
 - (五) 編輯委員會以尊重稿件內容為原則，力求避免修改，惟保留此項權利。
- 本刊物嚴禁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規範的稿件。編輯委員會以尊重稿件內容為原則，力求避免修改，惟保留此項權利。
- 投稿暨聯絡方式：
 - (一) 前往 <http://politics.ntu.edu.tw/?p=583#rule-3> 下載投稿表格
 - (二) 將稿件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 PoliSciReview@ntu.edu.tw